

海口“五公祠”创建始末

基于张之洞与朱采往来电文的解读

【编者按】



张之洞晚年照。 资料图

或许没有哪一处历史遗存能如此穿越时空，将海外与中原紧密相连，让人徜徉其间时感慨万千；或许没有哪座文化坐标能如此承前启后，凝聚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令人整理思绪后振奋不已。它，便是海口“五公祠”，一座被誉为“海南第一楼”的人文圣地。

“五公祠”究竟缘何而建？让我们从两广总督张之洞与雷琼道朱采的往来电报中，探寻一段始于苏东坡、兴于张之洞的独特海南文化之旅——那是一场持续近800年的超级文化接力赛，在古老琼州大地上徐徐上演。

张之洞：“洞酌亭”还在吗？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88年1月12日），琼州、廉州、潮州等地官员接到张之洞的急电：“本部堂腊月初二日（1888年1月14日）出巡各海口，先琼州，次北海，次白龙尾，次汕头，察看沿海形势，不登岸，火食船上自备，各地方勿得预备行台及供应，违者定予未便。该镇、将、道、府、州、县等均俟轮抵各口，前来接见，勿迎。切切！”

三日，十二月初五日（1888年1月17日），张之洞乘新造的广甲兵轮抵达海口港，随即登岸视察。他巡视琼州府城及海口所城，测量西场、金牛岭、水英等地，为后续修建海口炮台做准备。民国《琼山县志》中记：“巡海至琼，赴道署商办海防事宜，委筑秀英海边炮台，亲为擘画，悉中机宜。”

据张之洞电文，十二月初七日，他西北行至廉州北海镇（今北海市）。这表明，他在海南停留了两晚。

巡洋途中，张之洞于十二月十八日（1888年1月30日）接连发出两封电令：致琼州朱道（朱采）、崖州唐牧（唐镜沅）：“闻唐相李卫公德裕有后裔在北乡，已变为黎俗。务速访求两三人，须确实有征验者，善为劝导，资送来省，当优给衣粮，令谋出路。其家如有李相故物，婉为购致一两种，重价不惜。”又致琼州朱道、儋州徐守（徐玮文）：“苏文忠居琼日有洞酌亭，在今府城内，泉甚甘，遗址今尚存否？即查明速覆。拟筹款建祠，以章先贤。”

此次巡洋本为海防，张之洞亲赴道署商办炮台事宜，擘画修筑海口秀英炮台，闻名当世。之所以兴建“五公祠”、李德裕之所以成为所祀第一公，此乃肇端。

探花出身的张之洞，既是朝廷封疆大吏，又是苏东坡的拥趸，在都门时常主持“寿苏会”，一生研习苏氏书法。亲临东坡谪居之地，他岂能忘怀？拜谒海瑞墓后，或因无暇探访遗存，这才心急火燎地发出查探“洞酌亭”的电令。

朱采：“重修费不过千金”

收到张之洞电报三日，朱采、徐玮文于十二月二十一日（1888年2月2日）复电：“苏文忠洞酌亭在城北不远，上为苏公祠，下临苏泉，泉甚甘，外江人官此者均汲此泉以饮，剖竹符调水，步公故事。祠虽倾废，幸而规模尚存，重修费不过千金，职道等力所能及。俟明春开工再行具报。”此往来电函，恰似一场历史文化对话，开启复活琼崖的文化之旅。

朱采（1833—1901），字亮生，号云亭、眼仙，浙江嘉兴人。同治三年（1864年）优贡生，光绪九年（1883年）任山西汾州知府。志书称其“工技熟，明吏理，侨寓石佛市，李鸿章识其才时，密疏荐之，累官至雷琼道”。

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一日（1887年6月2日），新任雷琼道朱采抵海口，两天后正式履任。这位文武兼备、行事“质实卓卓”且又熟悉建筑技术的官员，通过重修“苏公祠”、兴建“五公祠”，令海南文化格局焕然一新。

张之洞请地方官查覆“洞酌亭”，远非简单修复，而是计划“筹款建祠，以章先贤”。此祠即城北“洞酌亭”旁的苏公祠。

光绪年间，已经倾废的苏公祠，虽“规模尚存，重修费不过千金”，朱采表示“力所能及”。然而，张之洞要求将祠堂修得宏伟严整，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1888年12月15日）电询进展时说：“苏祠竣工否？可修治阙整，鄙人捐千金，并飭局筹闲款千金助工。”由于张之洞要求“修治阙整”，并带头捐款，另挤出公款，这使得苏公祠的重建规模远超预期。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1889年1月2日），朱采回电：“苏祠年内可竣，其后三进基址狭小，右为苏泉书院，左为金粟院紧贴，并无隙地，后靠在冈上，有古冢亦无可展拓，所用不及千金，业由职道捐修，不敢再领巨款。”然而，款项很快到位。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日（1889年2月19日），朱采电禀张之洞：“‘镇涛’本日到，完台捐修苏祠银一千两、善后局发款一千两均照收，一切遵照办理。”

有此巨款，朱采按“修治阙整”之愿实施。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1889年10月16日），他电告张之洞：“苏公祠拟造大门一座，大殿一进，花厅一座，旁造

书楼三间，偏房三间，耳房两间，业于本日启土动工，容绘图帖说另禀外，职道采禀。”

“工技熟”的朱采用心修建，实地查勘，又调整方案，务使重修后的苏公祠显现壮观之势，改造后的洞酌亭成为游览之所。光绪十五年十月十七日（1889年11月9日），他电称：“苏文忠祠正殿初拟修葺，后亲自履勘，栋梁皆已虫蛀，且规制太小，观瞻未肃，非重建不可，于夏杪兴工，较前深七尺、广四尺、高二尺，栋梁用加北木椽，题用绿楠木，皆伐木局物，颇为壮观。此后进也。现拟将前进洞酌亭改造，俾成一游览之所，一俟建有规模，再行电禀。”

此时，张之洞已调任湖广总督。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89年11月14日），他交卸两广督篆；二十七日（11月19日），启程赴武昌。离别之际，朱采于十月二十五日（11月17日）电称：“顷闻宪台业已交卸，宪节何日启行，职道以僭案未了，不克到省恭送，歉疚何极。除修禀外，谨肃电劄送。”同日，朱采还另电称：“苏公祠已鸠工庀材，敬求宪台豫书匾额一方，楹联一副，交善后局制成颁发。”

此两电均是当年十月二十五日发、三十日到，彼时张之洞已经在去武昌的途中。

历史虽让张之洞与海南结缘，却又留有一丝遗憾。若他应允朱采之请，为苏公祠题写匾额、楹联，必成琼崖人文佳话。如今所见，乃琼崖道尹朱为瀚1915年所撰：“此地能开眼界，何人可配眉山。”（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书法家麦华三1980年重书。）



1934年《大众画报》对海口市五公祠的图片报道，左上图应为五公祠最初的大门照片。

图片来源：上海图书馆



朱采像。 陈耿翻拍自《清芬阁集》

朱采还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冬向督鄂的张之洞汇报：“受业承乏琼台，忽忽五稔……苏公祠前蒙夫子大人捐廉发款，并批拨琼款三千金，共五千金。大殿墙门均用洋木，业于去年造竣；本年又添建大书楼一座，均用石盐木，尚未竣工。”

张之洞：“祠内可多建一院”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1888年12月15日），张之洞在电报中不仅提出捐资千金、筹款千金，将苏公祠修葺得“阙整”，更添一策：“祠内可多建一院，并祀历代谪琼名贤。”此言一出，便为朱采衔命兴建“五公祠”埋下了伏笔。

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冬，“五公祠”终成琼崖胜景。据1940年琼山县政府编印的《五公祠志略》载：“迨光绪十五年（1889年），朱观察采景仰前贤，始于郡郊之北建海南第一楼，以祀李卫公德裕、李忠定纲、赵忠简鼎、李庄简光、胡忠简铨，颜曰‘五公祠’。复于祠之左右建精舍，仿学海堂例，设专课三十名，选高才生肄业其中，采购经籍，课经史词章之学。又建苏公祠于楼之东偏，以存古迹。崇基峻宇，蔚为大观。费二万余金，均从公款筹拨。”

今年冬天，朱采将此事郑重禀告张之洞继任者，详述始末：“郡城北里许，旧有苏公祠、洞酌亭、浮粟泉，为府会胜境。盖即当时苏文忠公辟地引泉之所，而今以祀公者。惟苏祠旧制庳浅，亭亦破坏郁塞，不甚壮观。其历代谪琼名贤，仅于苏祠旁龛附祀，亦觉未安。十三年（1887年）冬间，前宪台张巡海至琼，有改修之意，捐款兴建，飭令筹办。”此言道明他奉张之洞之命，以“彰先贤”为旨，兴土木而建新祠。

朱采更详述其规划建设：“职道因移建洞酌亭，而于亭之旧址创观稼轩，以资眺望。复迁移金粟庵，展拓基址，铲削土山，崇岗至十丈之宽，二十余丈之深，地势顿觉宽广。即于洞酌亭西首，改建苏公正祠。前有大门一进，规制颇宏。再西则高筑层楼，俯视一切。以祠历代谪琼名贤，如唐李卫公德裕，宋李忠定纲、赵忠简公鼎、李庄简公光、胡忠简公铨等，即名曰‘五公祠’。经营前后五载，至今冬而落成。”

他创造性贯彻张之洞旨意，移亭建轩，拓地筑祠，将苏公祠整顿得“规制颇宏”，更于开阔处高筑层楼“海南第一楼”，祀李德裕、李纲、赵鼎、李光、胡铨五公，终成“以彰先贤”之心愿。

翌年，即1893年，朱采向张之洞报告修筑秀英炮台情况，还不忘告知“老领导”：“前奉宪台飭建之昭忠祠、苏公祠、五公祠及斋房、学舍等，累年陆续创建，于上年一律竣工。”这些建筑规模与格局，让我们今天得以以“群”叙事：“五公祠”是海南历史最悠久、建制规模最大、馆藏文物最为丰富的古典寺庙园林景观建筑群。

在此书信中，朱采还提到：“惜乎！潘霨初先生于六月初去世，此邦人士未免失所矜式耳。”

潘霨初即海南文昌举人潘存，他是张之洞的旧友，也是朱采的至交。潘存被时人称为“当代硕儒”。

朱采驻琼前后六载，“受病甚深，血气大亏，诸病交作”，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夏告假卸篆，与潘存海滨“道旁话别”，怆然欲绝。潘存归里途中，病势骤增，“遽作古人”，于六月初八日（1893年7月20日）卒，终年76岁。朱采归里后，愤于甲午战败，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逝世，终年69岁。

两位六七十岁被病弱所折磨的博学儒儒，以他们的道德文章，共同书写海南历史的一段文化传奇。今日，朱采所题“海南第一楼”匾额犹存，其气节随楼不朽；潘存为“五公祠”所撰三联，其文采与祠同辉：“唐嗟未造，宋恨偏安，天下几才置之海外；道继前贤，教开后学，乾坤有正气在此楼中。”“东坡之外有五子，大海以南第一楼。”“万里投荒开地脉，千年崇祀见天心。”

回望来路，朱采履任雷琼期间，重修“苏公祠”，创建“五公祠”，用“海南第一楼”的标高，演绎了“沧海何曾断地脉”的内涵，震荡古今。

（作者系海南省史学会会长）

朱采创建的“五公祠”主体建筑和题写的“海南第一楼”牌匾。 李幸璜 摄

新著《海南盐业史》

展现南疆海盐千年传承

■ 詹贤武 李勃

盐为“百味之首”，不仅是民生根本，亦为历代赋税大宗，曾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海南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盐业发展轨迹。近日，海南师范大学夏强副教授所著《海南盐业史》正式出版发行，全书逾三十万字，从多重视角系统梳理了海南岛自史前至1949年的盐业历史，不仅填补了区域盐业史研究的空白，更以扎实的史料和新颖的见解，为理解海南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窗口。

《海南盐业史》有着鲜明的学术特色。

它填补了学术空白，具有开创性意义。此前，关于海南盐业的论述多散见于海南经济通史或中国盐业史的个别章节或段落，整体上缺乏系统性。在海南地方史研究领域，长期以来通史与热门议题研究较多，而基础性的专门史研究相对薄弱，亟待补充与深化。本书作为首部以海南盐业为核心，并融合经济史、区域史、技术史与社会史视角的系统性专著，对推动海南各类专门史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该书脉络分明清晰，体例规范严谨。全书除绪论与余论外共设七章。第一章为总论，深入探讨历代制盐工艺与食盐偏好，详细分析了海南独特的热带气候如何影响“煎盐”向“晒盐”的技术演进，以及滨海与山区民众迥异的用盐习惯。第二至七章则严格遵循历史时序，跨越史前至元、明、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前期及全面抗战胜利后六个阶段。除首尾章节外，各章均采用统一的论述框架：先厘清时代背景与核心概念，再深入考察产销情况、盐政体制、税收负担及灶户生计。这种专题与断代相结合的写法，确保了全书逻辑严密，便于读者整体把握海南盐业的历史全貌。

它立足漫长时段，提出新颖观点。在此略举四例。一是产盐区地理分布的演变：海南产盐地最初零星分布于西北一隅，明清时期扩散至全岛四方，近代以后，因制盐方式改变和自然环境驱动，重心逐步向西南部聚集。二是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海南盐业在宋代初设盐官，明中前期盐政严密，而晚明至清代则大规模裁撤盐官，权责改归州县，民国时期又复设三盐场等机构，重新强化国家对盐业的控制。三是税制与市场的逐步现代化：盐税征收经历了从实物税到货币税，从“按丁计征”到流通环节征税的演进，体现了税制的现代化转型，运销也从“计口授盐”的配给制最终转变为自由贩运制。四是市场半径的扩张：琼盐长期仅在岛内销售，近代则迎来了爆发式扩张——琼盐北运广州，转销湘赣；西济钦廉，深入广西；甚至远销新加坡等地，成为海南的“拳头产品”。

该书还跨界多维研究，观照地方社会。书中既有对海南食盐产销的系统研究，也有对盐法制度的梳理，更有对盐与地方社会文化互动的探讨。在盐业社会组织方面，书中描绘了从宋元时期的官府“聚灶公煎”，到明清的家庭经营，再到近代的股份公司的演变历程。在技术史层面，学界一般认为“晒盐法”始于宋代的福建盐区。然而，本书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儋州洋浦独特的自然禀赋，使其成为中国最早的晒盐技术产生地。这一观点重新定义了海南在中国制盐技术演进中的地位。

在饮食文化方面，书中也进行了溯源：滨海地带偏好熟盐，熟盐味淡，从而塑造了海南菜追求清淡、原汁原味的风格；而山区黎族、苗族群众则因特殊生活环境形成了高盐饮食传统。

此外，《海南盐业史》扎根史料文献，做好实证研究。本书不仅博采正史、方志、政书、报刊等传统文献，还深入挖掘了奏疏、档案、考古简报等罕见材料。如书中大量使用档案，极大地丰富了研究内涵，使全书摆脱了以往“资料有限、描述泛泛”的窘境。尤为难得的是，书中还融入了大量的实地田野调查资料，通过历史记载与盐场实拍相结合，生动地再现了海南盐业的历史实态。



《海南盐业史》书影。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